

《文明小史》:晚清维新历史的一面镜子

李丹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晚清小说空前繁荣,作为一位影响很大的谴责小说家,除《官场现形记》外,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样具有研究价值。《文明小史》采用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最早从维新的角度,全面揭示了维新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是一部反映晚清社会的代表作品。

关键词:谴责小说;李伯元;《文明小史》;晚清;维新历史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0)05-0079-08

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有1000多种作品[1](2页),而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说,是“清末最大、最有成就的小说派别,产生了《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等作品,出现了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这批清末真正的小说家”[2](24页)。这些小说,对当时社会“揭发伏弊,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3](252页),以强烈的政治倾向,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以及取材于现实等前所未有的新姿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冲击了古典小说的传统,为五四以后的现代小说开启了先河,在小说史上有着枢纽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作家只顾声嘶力竭地骂得痛快,再加上写作时间匆忙,谴责小说没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出现堪称第一流的作家作品。近几年来,随着近代文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谴责小说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资料的整理、作家作品的研究都称得上硕果累累,但仍有不少空白点。李伯元是一位影响极大的谴责小说家,“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坊贾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说,假其名以出版者,其见重于当时若是”[4](10页)。1965年底至1966年初,《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开展了关于李伯元作品思想倾向的讨论,不少观点带着浓

厚的时代政治气息。对他的作品,研究者的眼光主要集中在《官场现形记》上,而他的另一名著《文明小史》,专门研究的论文寥寥无几,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对之只作粗略的介绍,有的评语也失之偏颇。也有的观点认为:“我们研究近代法国小说若不知道小仲马的《茶花女》,我们研究近代俄国小说若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复活》,岂是能原谅的疏忽吗?因此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小说只知道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而忽略了他的《文明小史》,那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憾!”[5](142页)虽有溢美之词,但从中可见《文明小史》的价值。

《文明小史》创作并发表于1903—1905年,此时的中国,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正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不得不推出变法自强的新政以自保。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制服清朝统治者,使之成为驯服的工具,就处心积虑地在政治上加强控制,……要求清政府进行所谓改革,实施维新新政”[6](392页),以便使这个政权更能适合他们的需要。“辛丑条约”的订立,使中国“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了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属性的地步”[7](183页)。作为全国统治者的清朝廷,为了讨好列强,博取列强的信任,1901年1月29日,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光绪

收稿日期:1999-11-14

作者简介:李丹(1964—),女,四川夹江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便颁发预约变法的上谕,同年3月,设立督办处,具体负责新政,拉开了变法自强的帷幕。另一方面,清廷高唱变法,也是“为了应付国内的危机,‘辛丑条约’的订立虽然使它逃避了从外国来的危机,但是国内的危机却日益严重了。不但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级、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商人、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清朝政府的不信任感也是空前增加了。为了使这些阶级、阶层感到这个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重新弹起光绪皇帝弹过的调子”[8](829页)。不过,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封建统治政权披上维新的外衣,而求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欢心。正如开办官僚盛宣怀为朝廷草拟的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所言:“敝国现议实行新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9](931页)洋务领袖张之洞也认为:“非变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10](108页)变法的实质不言而喻。

1901—1905年,清政府连续颁发谕旨,提出推行的“新政”多达30余项,主要内容有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提倡出国留学;改革军制,编练新军;修订刑律。于是,新政新学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一种时髦。在这种情形下,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最早从维新的角度,揭露维新时期种种黑暗,书名就很明确地反映了创作目的和作品内容。李伯元敏感地从宏观预测了历史:“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11](125页)为了记下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他采用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为创作素材,“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时期的那个时代,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从官宪一直到人民,从内政一直到外交。所描写的地带,不是某一个省或某一个镇,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12](9页)。

从一个好的文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13](463页)。《文明小史》对当时社会暴露之全面,确实令人惊叹。它反映出在新政实施过程中,“新旧思想的冲突,人民与官僚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矛盾,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并不能得到消弭,相反地更加激烈,一直发展到进行革命。这就构成了《文明小史》反映维新运动时期阶级矛盾的主要特点,也就是这部小说能以获得存在并有别于《官场现形记》的地方”[14]。《文明小史》和《官场现形记》虽同为暴露晚清黑暗的作品,但主题、内容、人物都有许多不同。《官场现形记》集中暴露了晚清官场的种种黑暗、污秽、无耻、昏庸、腐败;《文明小史》则集中暴露了晚清维新时期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假维新现象,其中对官吏的暴露发展了《官场现形记》的主题。

一 揭露官吏对新政的虚伪态度

在《文明小史》中,李伯元以维新为主要话题,集中表现了晚清官场对新政的虚伪态度。安徽巡抚黄升声称:“常听见人家说起,说维新党同哥老会是串通一气的。长江之内,遍地都是哥老会,如果得罪了维新党,设或他们串出事情,包管我这巡抚做不成功。所以外面上,少不得敷衍他们,做两樁维新的事情给他们瞧瞧,显见我并不是那顽固守旧之辈,他们或者不来与我为难,能够保得我的任上不出乱子,已是微天之幸了。”(四十三回)为保官而作表面上的维新,是当时官吏们的一大特征。何况,中国官吏奴性最强,为保官和升官,他们都无条件地服从并讨好上司,“上头要行新政,就说新政的话”(二十四回),乃是他们揣摩朝廷意思行事的共同心声。这次清廷变法,本是迫不得已、掩人耳目之举,并非是要真的有所革除,对此,官吏们揣摩得非常清楚:“目下虽然万口一词,说维新维新,却不可把维新两字看得认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只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15]这话道出了官吏们对维新所采取的态度。他们只管跟着上面沸反盈天地闹,至于新政是什么,为什么要搞,怎么搞,那都是无所谓的。正如立宪一事,“外边得了消息,便天天有人嚷着‘立宪!立宪!’其实叫军机处议奏的,也只晓得‘立宪!立宪!’军机处各大臣,虽经洋翰林洋进士一番陶熔鼓铸,也只晓得‘立宪!立宪!’‘立宪!立宪!’之下就没有文章了。”(六十回)如此重大的变革,不过是一场叫嚷热闹的空城戏而已,几句话,把官僚方面对维新的真实态度说尽了。当时,清廷尚未下诏,只是全国上下呼声很大,慈禧太后也表示考虑此事,让军机处议论,李伯元便敏锐地指出其中的虚伪。同时代的作品也写到了清廷立宪:“自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诏天下臣民,预备立宪,于是在朝者旅进旅退,揖让相语曰:‘立宪!立宪!’在野者昼眠夕寐,引颈以望曰:‘立宪!立宪!’在朝者对于在野者曰:‘封、锁、拿、打、递、解、杀,立宪!立宪!’在野者对于在朝者曰:‘跪、伏、怕、受压制、逃、避、入外籍、挂洋旗,立宪!立宪!’如此者年复一年,以达于光绪万岁。”[16](77页)这场闹戏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本来清政府是“拿着立宪两个字来做楚歌用,想去吹散那革命的意思”[17](170页)。由此可见李伯元高明的预见。

“1901年8月,清政府明令变通科举章程,废八股,改试策论,并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18](194页)。办学堂便成为极时髦的行为,因此投机者蜂起,康彝芳以此为升官捷径,王宋卿、杨之翔在落魄时以此为暂时栖身之所,并欲以此为跳板,结交官僚,以作晋升之阶。在山东,由于姬抚台提倡办学,要办满一百个学堂,于是潍县钱县令便

迎合抚宪的意思,将原来的既导书院改成学堂。当时社会的办学,类此者多矣。“裴景福性狡,而好持局面,以示干员手段。新政并非所乐,然改书院为学堂之旨甫下,裴即于禹山书院门首,高悬番禺县中西学堂七字匾额,入内观之,则仍课时文试律,旧章丝毫未改也”[19]。真诚办学有几人?更有书贾王毓生,科举落榜后,见办学堂有利可图,便跃跃欲试,“开个小学堂,请几位西文教习在内教课,……只须收到一百二十位学生,已是很大一笔出息”(三十四回)。而且办学可以成为社会名流,名利双收。上海培贤学堂的孔监督亦把办学堂比作买卖。作者把办学者的种种丑态尽收笔底,用书中人物周翰林之话对此作了概括:“那办学堂更是可笑,他也不晓得什么叫教育,只道中国没得人才,要想从这里头培植几个人才出来,这是上等的办学堂的宗旨了。其次,则为了上司重这个,他便认真些,有的将书院改个名目,略略置办些仪器书籍,把膏火改充学费,一举两得,上司也不能说他不是。还有一样,自己功名不得意,一样是进士翰林,放不到差,得不着缺,借这办学堂博点名誉,弄几文薪水混过,也是有的。”(三十一回)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本是进步之举,可事实上,黄安澜“关于波兰衰亡战史”的策论是一段“波”一段“兰”分按的,竟然中了举,而王毓生则因“语多伤时”而落榜。可见在主考官那里,依然要的是八股精神。变通后的科举,“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20](55页)。

清政府1901年开始编练新军,1902年向全国推广北洋和湖北的练军经验,并大量建立军事学堂,培养军官。作品中第五十六回“阅大操耀武天津卫”描绘了北洋阅兵的情形,方制台即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这段阅操描写有700字左右,直抄《邻女语》第五回“袁世凯阅兵”)[21](36页),场面十分浩大。可惜,作为武备学堂总办的余日本,看了半天看昏了,也没看出个名堂,其他各省来观操的道府,“有两位带干粮的尚勉强得过,有两位没有带干粮以及发了烟瘾的,都个个面无人色,由家人架上轿子,飞也似地抬了回去”。这样的人,能回去指导或训练新军?这便是清政府的军队指挥者。清廷的新政,便这样热热闹闹地在官吏们的心领神会中贯彻下去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希望,那黑暗反倒增加了几倍”[22](113页)。

当然,现实生活中也有真诚地推行新政的官吏,李伯元的堂侄李祖年便是其中之一。他“奉令举办新政,踔厉无前,治泰安则倡设学堂,治益都则相土之宜,创办蚕桑”[23],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他和李伯元一起长大,思想也很相近。在作品中,李伯元以张之洞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官僚形象——湖广总督,“很讲求新法,颇为民兴利。他到任七八年,纺纱局有了,枪炮局有了,讲洋务的讲洋务,讲农功的讲农功,文有文学堂,武有武学堂,以至编书的,做报的,大大小小事情,他老人家真

是干得不少”(十二回)。可惜,这样的官吏在现实生活中太少了。

以端方为原形的出洋考察政治大员平正,更是李伯元寄托改革社会的希望所在。平中丞考察西洋政治,是为了回国后“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六十回)。这正是李伯元的希望,说明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尚抱有极大的幻想,对清廷的新政也抱有极大的希望,正是出于如此真诚的希望,他才对新政推行中的种种丑恶虚伪的现象加以揭露。他没有从根本上看清朝廷假维新的实质,而把一切过错都怪罪于官场,很明确地体现了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封建阶级是他心爱的阶级,他进行小说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劝诫做官的人“知过必改”[24],“稍尽为民父母之心”[25](189页),是欲拯救这一阶级。可惜,并非凡事皆遂人愿,文学中存在着形象大于思维的现象,李伯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客观上为晚清维新政治唱出了一曲无情的挽歌。

二 暴露了假维新人物的各种丑态

《文明小史》描写了一批年轻的、官场外的维新人物,有洋行买办、官府翻译、趋时的纨绔弟子、混饭吃的知识分子、游手好闲的留学生、假洋鬼子等,这些人物都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的特殊产物,与传统儒学青年截然不同。他们沾染了一些维新习气,便“趁维新之风日盛,到处投机取巧,招摇撞骗。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满口新名词,什么‘平权’、‘自由’不绝于口,只会演说、集会、喊口号,可是没有行动。二、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生活腐化,剪辫子,穿西装,处处模仿洋人,这帮人整天在茶馆酒楼和妓院中鬼混,把抽鸦片说成‘讲卫生’,嫖妓女称作‘主张男女平权’,表面上忧国忧民,到处集会,其实对国事一窍不通,只想赚钱混饭吃”[26](335页)。李伯元深恨这些人,花了不少篇幅把这些人物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作品从贾氏三兄弟开始引出这班人,贾子猷(假自由)、贾平泉(假平权)、贾葛民(假革命)便极明显地点出了这些人的本质。魏榜贤改穿西装,处处学外国人,可就是不敢洗澡;黄国民剪了短发,却不敢常剪,他们都是怕伤风,学外国人又学不像,只成为一个个假洋鬼子。刘齐礼从日本回来,剪了辫子,自称是为了革命起来容易些,实际上是睡着了被人铰的,并嫌家里的房子小了,不通空气,菜也不如番菜馆的好吃。这些人言必是外国的好。对这些人,“我看见他们见着外国人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臭屁,也当着香囊般崇拜,倘或是外国人所无的,即是当真的一个活宝,也视同狗屎般的鄙薄,那一种井蛙冰鼠的谬见解,我是至死都不佩服的”[17](171页)。李伯元的暴露正体现了这种批判。刘学深成天混迹于青楼妓院,还以新名词作掩饰:“良家是人,妓女亦是人,……我们若

小看他,便大背了平等的宗旨。”(十九回)郭之问的“鸦片经”更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论理呢,我们这新学家就抽不得这种烟,因为这烟是害人的。起初兄弟也想戒掉,后来想到为人在世,总得有点自由之乐,我的抽烟就是我的自由权,虽父母亦不能干预的。”(十八回)安绍山(即康有为)装腔作势,躲在装机关的房子里大谈报国。颜铁回(即梁启超)热衷功名,却不欲为人知,把自己反锁在家里练习白摺小楷。劳航芥口说“我们中国,生生就坏在这条辫子”(四十七回),在上海,却为讨得一妓女的喜欢而去安上了假辫子。余小琴更是个钻营的卑劣小人,借着冲天炮的权势嫖妓卖缺;买办萧楚涛勾通妓女骗取钱财;秦凤梧挥霍了开矿的一大笔资本,使得轰轰烈烈的矿业公司成为泡影。诸如此类,李伯元把这些中国“文明人”的“文明行动”充分暴露了出来。他对这班维新人物,从领袖到士卒,无一不抱着极大的反感。这里值得说明一点,这并不代表李伯元对维新的反感,“他对许多维新的社会事业,却极力赞同,这也不妨解释作专一对人的问题”[12](82页)。当时站在各种不同立场上来反对、丑化康梁的作品很多,比较突出的是黄小配的《大马扁》,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把康有为写成伪圣人、大骗子、大流氓。自从戊戌变法失败,康梁逃到国外,躲开了清政府的屠刀以后,在国人中引起对他们的强烈不满或不解,骂他们是胆小鬼。我猜测,李伯元便属于这一类,从他把康有为安排在有机器的黑房子里便可看出端倪。本来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也是进步的,这一点必须看到,至于在后来的革命潮流中成为保皇党,落后于历史的要求,这是另一码事。

同时,在对待这些维新人物的态度上,很明显地体现出作者传统的道德观。他同其他谴责小说家一样,对儒家的道德观念深信不疑,“用道德价值判断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巨大变化和人们的社会行为”[27]。在《文明小史》中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孝道。讲家庭革命的刘齐礼被捕后,李伯元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写道:“只能与别的囚犯平等,再不能听他自由了。”(四十二回)余小琴对他父亲说:“论名分我和你是父子,论权限我和你是平等。”自在山人评曰:“此种口吻,可谓闻所未闻。”(五十六回)李伯元从小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从观念上他不能接受这种不孝行为。同时,他三岁丧父,在堂伯父李念仔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从小便“很孝顺母亲”[28](41页),他的感情也不可能原谅忤逆长辈的行为。因此,作品中,粗心浮气的聂慕政因为孝顺,收到父亲病危的信时便急得流泪,而得到李伯元的同情:“聂慕政虽是维新,天性独厚,大异于家庭谈革命,父子平权一流。”(三十七回,自在山民评语)并为他安排了去参加最严肃最壮烈的暗杀卖国官僚的行为,使他的形象比那些只会讲大话的维新人士高出了许

多。

三 揭露了官吏们对外的卑怯和对人民的酷压

中国的大门被洋人用洋枪洋炮轰开后,中国人天下独尊的观念也随之被攻破,不少人在这突变面前变得手足无措,无可适从,极端的妄自尊大便成了极端的自卑。“本书作者的意思无非欲表现外人挟其新文明的势力侵入中国后,一般官吏丧失了做人的自尊心,个人没有好处。民族前途尤为危险”[5](144页)。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官吏们对外国人由怕而媚,唯恐有得罪处,“现在办洋务的,认定了一个模棱主义,不管便宜吃亏,只要没事便罢,从不肯讲求一点实在的”(三十一回)。自中央朝廷到地方衙门,从军机大臣、封疆大员到佐杂小官,无不如此。谴责官吏们在洋人面前的奴颜卑怯,便成为谴责小说的一大主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宦海》、《孽海花》等作品对此都作了深刻的揭露。《文明小史》的揭露则很充分地表现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情况。

当时官吏们一遇上对外交涉,只会一味地听凭洋人作主。山东钱小篛去处理外国军队驻扎城门外骚扰百姓一事时说,“我的主意,是不必叫他们移营,情愿每日贴他些军饷,求他约束兵丁不要骚扰就是了”(三十八回),真是荒唐之极。嵯县一教士被海盗杀害,赔银十万两,还为教士铸一铜像,官员们居然说是外交上的胜利。说:“现在国家弱到这种田地,再不同人家柔软些,请教你从哪里硬出来?总而言之一句话,外国人到底喜欢那样,我们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怎么会晓得?既不晓得,自然磕来碰去,赛如同瞎子一样,怎么会讨好呢?现在需要不做瞎子,除非有一个搀瞎子的人,这个搀瞎子的,请教我们中国人那一位有这种本事,能当得来?不瞒诸公说,兄弟昨日已叫文案上,替兄弟拟好一个摺稿,奏明上头,看那一国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哪一国的人里头挑选一个同我们要好的,聘他做个顾问官,以后办起交涉来,都一概同他商量。他摸熟外国人的脾气,那椿好答应,那椿不好答应,等他出口,自然那些外国人没得批评了。”(四十四回)这便是他们的“捋乱的良方”,“外交的上策”,不过是千方百计讨洋人的欢喜。还说“连朝廷尚要让他们三分,不要说是我们了”(四十三回),这便是他们媚外的最好理由。就是作者笔下的好官湖广总督也主张“礼让”外交。可见官吏们昏庸卑怯之至。《宦海》中的邹制军,曾得罪过外国人,吃了苦头,便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提到洋字,便慌忙说道:“你不要这般糊涂,我们中国今日之下,衰弱到这步田地,你还可要和外国人讲理么?外国人是专讲强权的,哪里和你讲什么理?”[29](105页)其论调和《文明小史》中官吏们一样,可见这反映出的是官吏们洋务运动上的普遍情形和普遍心理,民族的尊严、国家的主权,都被

这些人弃之脑后，竟然恬不知耻地说“如果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24]。有奶便是娘，一副奸奸嘴脸。李伯元对这些官吏的暴露，为人们展现出了“文明世界”的媚外奇观，抨击了清政府所奉行的“礼让”外交政策。

在洋大人面前卑怯得像兔子，在百姓面前凶恶似猛虎，乃是当时官吏们的特点。《文明小史》前十二回深刻地暴露了这点，同时，也描绘了群众的自发反抗。永顺府知府柳继贤因店小二打碎了洋人的洋磁碗，便扣押了店小二父子和地保，主动去拜会洋矿师，停止了正在举行的生童考试，还惴惴不安，而生童们则怨声载道，又因采矿要破坏他们的风水，于是在黄举人的鼓动下，大开明伦堂，吓得洋矿师一行逾墙而逃，柳知府、金委员一群官吏更是躲在二门内吓得死去活来。继任傅祝登更媚外，下车伊始，便重办店小二父子、地保以及一群将洋人当盗马贼送回城的乡下人，把黄秀才等十几个会文的书生当作余孽会党抓起来，还大开捐局，搜刮民财，把永顺府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可面对来无理要人的洋教士，他始则目瞪口呆，继则苦苦哀求，再没有了一点威风。沉重的捐税，使百姓自发地起来反抗，他们捣毁了捐局，打了贪官污吏，迫使傅祝登取消了这些捐税，可百姓还不解恨，在傅离任时，他们和那帮被无故冤枉的秀才的朋友们一起，打碎傅知府生祠，撕毁万民伞，把知府大人吓得落荒而逃才保全了性命。生童闹事、百姓抗捐以及三十五回聂慕政刺杀卖国官僚等事件的描写，写出了洋人和官僚们在人民力量面前的颤抖，暴露了维新时期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卖国者与爱国者之间的激烈斗争，这一点是很可贵的。众多的谴责小说，并没有几本面对这一现实，《孽海花》虽写了革命党，可它产生的时间远在《文明小史》之后，《官场现形记》中也写了农民的自发反抗，其声势和冲击力不及《文明小史》。李伯元在作品中把黄举人写成地痞、流氓，让这自发的反抗一经官府弹压或绅士调解，便自动解体，这是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所决定的。如果黄举人被写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倒让我们不能相信是李伯元写的了。对李伯元来说，他不允许推翻封建主义的行为，他的堂祖父最显赫的政绩便是肃清了曹州的捻军[30]。在作品中，他骂农民运动是洪逆、拳匪，骂革命党人为叛逆，但清朝统治者太腐败，他又希望人民的反抗会让统治者清醒一点，因此在作品中，他用人民的反抗来惩治贪官污吏，让他们丢掉了最不想失去的官位，但他不敢让民众继续反抗下去，只让他们适可而止，赶走一个贪官污吏就行了，这表现出他对人民的力量欲利用又害怕的心理。他主张的是用“水磨

功夫”来进行社会变革，而不是暴力。

《文明小史》还写了假洋鬼子劳航芥在戏院被打一事（五十回），这是李伯元惩治假维新党人的一种手段，他让他深恨的人都遭到人民的反抗。这些描写，在相当程度上透露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孕育着革命的萌芽，可惜，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能看到这一点。

四 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在中国的嚣张气焰

反帝爱国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中国近代文学的始终，李伯元的作品也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其《庚子国变弹词》着重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杀戮：“自从破城洋兵入，惨毒情形不忍云。老弱牵连填沟壑，其余壮丁尽逃生。可怜遍地都无告，中泽哀鸿不忍闻。”[31]（807页）这正是在八国联军践踏下百姓苦难的实录。《官场现形记》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主权的侵略，如湖南巡抚的撤职与委任，竟都是洋人的旨意（五十八回），而《文明小史》则着重揭露传教士对中国百姓的精神侵略。

前面已说过，帝国主义为了使清政府更能适合他们统治中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需要，政治上要求清政府推行所谓新政，精神上则要奴化中国人，以达到他们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传教士便是当时进行精神侵略的主要力量。他们借传教之名，收罗教徒，“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32]（630页）。第八回“考洋装书生落难”中那个教士，背《康熙字典》是为了更好地揣摩中国国情，在表面上有很大的迷惑性。他热情地帮助落难的秀才，为他治病，帮他救出受冤枉的朋友，并把他们送到安全地。他宣称他们天主教无论到什么危难的时候，“只要闭着眼睛，一心对着天父，祷告天父，那天父没有不来教你”。从精神上征服了这批秀才。他们在中国多年，了解中国国情，颇知一般国民的心理。十五回中一位传教士散发福音书时，对一般人讲，“你们把这书带回去念念，大家都要发财的”。看见贾氏兄弟像是读书人，便改口道：“把这书带回去念念，将来一定中状元的。”可见他们在传教时是怎样迎合各种人心理的。传教士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33]（214页），他们在中国干了不少欺压人民、干涉内政的勾当。永顺府的教士向傅祝登要人时，态度十分强硬：“一见人，不容审问，立逼着一千人松了刑具，带了就走。”（十回）聂慕政入狱后，彭仲翔以入教为条件求黎巫来教士帮忙，黎巫来很高兴，找县令钱小笏要人，并蛮横地说：“料你们抚台也不敢不依我。”他们为了扩充教会势力，中国人遇到官司，只要找到他们，一入教，便可得到解脱，中国官方也无可奈何。作为前封疆大臣的陆夏夫面对前来请示良方的钱县令也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失了主权，办一个小小的犯

人,都要听外国人做主,兄弟没有话说,老同年还要提防刺客才是。”(三十八回)这些教士,虽然表面上讲着要在天父面前人人平等,可他们根本瞧不起中国人,诬蔑说:“贵国的人,只要银子,有了银子,他不但肯教给我说话,各式事情都肯告诉我晓得,只要有了银子,连他祖传的坟地都肯卖给我盖房子了。”(十三回)他们指责官吏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开心处且开心”。“你推我推,办不成一樁事,只想敷衍过去,不干自己就完了”。作品中李伯元把教士写成贪官的克星、冤民的救星,只是写出了表面现象,没有指出这些“善行”背后的侵略实质,把一切过失都归结为腐败和崇洋媚外的官场,削弱了作品反帝的深度。原因在于李伯元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英文[34](36页),不能不受到一点天父的教化,在上海数年,进一步接触到西方文明,他向往资产阶级的文明,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尽管如此,强烈的爱国思想不可能让他对帝国主义凌辱中国的暴行熟视无睹,他对国家主权的逐步丧失充满激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促使他真实地记下这段历史,记下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行。外国军队驻扎在山东诸城,外国士兵酗酒闹事,骚扰百姓,带兵官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本国的兵,扎到那里,算到那里,横竖你们中国的地方是大家公共的,现在山东就是我们本国势力圈所到的去处,那个敢阻挡我们。不要说你这个小小知县,就是你们山东的抚台,就是你们中国皇帝,也不敢不依。”(三十八回)蛮横而嚣张,好像他们才是中国的主人,难怪黄升这样讲:“我们中国如今还有什么主权好讲?现在哪个地方不是他们外国人的,我这个抚台做得成做不成,只凭他们一句话,他叫我走我就不敢不走,我就是赖着不走,他同里头说了,也总要赶我走的。”(四十四回)这话一方面说明了官吏的昏聩软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洋人已经侵占中国的主权。租界则更是中国主权范围外的中国土地,不管政府要抓什么要犯,只要一进入租界,官府就只有作一个遁逃数作罢。面对这一现象,李伯元借方立夫之口,表达了他的忧虑:“你说官府捉不到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造化吗?……做中国的奴隶固是可耻,做外国的奴隶可耻更甚!不但可耻,要是大家都如此,竟没得这个国度了,岂不可伤!”(二十六回)他的这一民族忧患意识是在外人强盛、官府软弱的情况下产生的,他用他的笔,启发并告诫人们:不能如此听凭它下去了,否则会成为亡国奴的。

五 反映当时新旧思想的尖锐冲突及其他

国门大开,西方的文明也逐步传了进来,冲击着古老闭塞的中华民族。清政府自1896年开始大量派出留学生,国内的翻译作品逐渐增多,新闻报刊也推波助澜,宣扬文明。《文明小史》中的贾氏兄弟,便是通过看报,了解外面世界,了解新文明,把各种新奇的洋货作为外国文明

的象征的,那如饥似渴之状,代表了不甘守旧的青年人对新文明的渴望。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新鲜事物的名称和外来词语,体现了李伯元对新文明的态度。

庚子国变后,“在一般社会中亦流行商战的观念。……国家贫穷日盛,列强可在华设厂制造,对华经济侵略日急。有些知识分子,并倡西洋之强盛在于重商之说,而清政府在孱弱的形势中,亦思借助商力民力,来开发资源,兴办实业”[35](84页)。李伯元赞成这一观念,他对商战的提倡者郑观应推崇备至,称其《盛世危言》是“中国谈维新,言变法”之鼻祖,“不愧一家经济之言也”[19]。《文明小史》中冯廉办商业学堂,教出人来赚外国人的钱,便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可是冯廉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刘乡绅认为学堂是误人子弟的:“既是说商务,那有开学堂的道理?你那见过学堂走出来的学生会做买卖的?那做买卖的,各有各的地方,钱铺里,当铺里,南货铺里,布店里,绸缎店里,皮货店里,还有些小本经纪,那个掌柜的不是学出来的?只不在学堂里学罢了。”(三十二回)顽固派守着老规矩,不肯挪一下位置,一派井蛙冰鼠之见。在西方列强的侵凌步步紧逼的历史条件下,顽固派们“很容易激发起一种盲目虚矫的排外心理定势,对‘人之富强弗问也,己之贫弱弗知也’”[36](81页),紧守着自己原有的,唯恐失去。他们用圣人之德来收容洋人的先进技艺,用祖宗之法来抵制一切变革。史载“光绪二十八年夏四月,派侍郎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修定呈览,候旨颁行”[37](518页)。作品中出现过英国的钦差大臣陆朝棻主持修改法律便是反映这一事实的。作品写到,修改法律遭到了刑部主事卢守经的反对,说:“这法律是太祖太宗传下来的,列圣相承,有添无改,如今全个儿废掉,弄些什么不管君臣、不管父子的法律来搀和着,像这般的闹起来,只怕安如磐石的中国,就有些儿不稳了。”(二十九回)卢守经们殊不知彼时的中国早就不稳了,正是要让它变得稳些,才实行这些小小的变动的。作品也写出了废除八股,在当时引起的更大争议:“好好的中国,被那班维新新人闹得不可收拾的了,你想八股取士,原是明太祖想出来的极好个法子。八股做得到家,这人总是纯谨之士。我们圣祖要想改变,尚且觉得改不来,依旧用了他,才能不出乱子。……他们一定要废,真不知是何居心!”(三十四回)黄詹事这一番话很能代表当时一些人的观点。试想当时大多数官僚都是以八股文及第的,他们总要竭力维持原来的传统,总把传统的一切当做最完善的、神圣的。这正如马克思所预测:“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的一场殊

死的决斗中死去。”[38](26页)我认为,当时新旧思想冲突的关键便是顽固派们要维持这种幻想,而维新派却要打破这种幻想。清廷所实施的那些皮毛维新,不能被顽固派们接受,也不能拯救天朝帝国的厄运。

同时,“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的民主思想,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中国的纲常名教的堤防”[39](262页)。作品写康彝芳作为江苏省学务总办,办了很多学堂。当时上海印了不少关于平等自由的新书,学生们纷纷去买,康彝芳因为“我现在办的这些学堂,全靠着压制手段部勒他们,倘若他们一个个都要是讲起平等来,不听我的节制,这差使还能当吗”,便要“禁掉这些书,书店里不准买,学堂里不准看”,并将“所有搜出来的各书,一律放在江宁府大堂底下,由康太尊亲自看着,付之一炬,统统销毁”(四十二回)。这件事便足以反映统治者对新思想的恐惧,也可以从中看到新旧思想尖锐冲突的情形。

当时的知识分子,受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倡言要保国、保种、保教。作品中,魏榜贤、刘学深以妇女天足为强种之先决条件,纽逢之以受文明教育的女学生为强种的希望,都认为要保国保种,首先得解放妇女。当时妇女界的一些情况,如不缠足会、女子学堂争取男女平权等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关于妇女问题的新旧思想冲突在当时也很激烈,顾锁的《黄绣球》对之作具体而又全面的反映。

译书也是当时一件极时髦的事,作品中附带写了一些吃翻译饭的文人。他们替书局译书,千字一元,书局也聘有专门润色之人。十七回中辛名池(新名词)便是一位润色专家,“只要经他的手勾来勾去,不通的地方改的改、

删的删,然后取出他那本秘本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一本好书便出来了。这正是当时翻译界风气的真实写照。更有不懂外文的王毓生“把人家译就的西文书籍,东抄西袭,作为自己译的东文稿子”,赚得一个好名声。至于一般所译之书,不过《男女交合大改良》、《传种新问题》之类,这则是李伯元对他们的调侃之语。

作品中还反映了官场一些起码的黑幕,如施道台花钱买缺,黄世昌让太太为制台按摩得缺,这在谴责小说中是暴露得最多的,《官场现形记》中表现得应有尽有。

此外,当时外国在中国修铁路(二十二回),洋人收取厘金(十五回),统一制造钱币的观点(四十八回),美国禁止华工条约,留日学生成立秘密团体(五十二回),以及当时的一些官场轶事(二十七回)、出洋笑话(五十一、五十二回)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

综上所述,清政府维新时期的各个方面都在《文明小史》中得到反映。难怪阿英处处以此书作为全面反映晚清社会的代表:“就表现一个变革的动乱时代来说,李伯元的小说,如其举《官场现形记》,是不如举《文明小史》更恰当的。”[12](8页)并在评价《黄绣球》一书时说:“能使我们全面地看到当时妇女运动的情况,这部书是如同《文明小史》般的反映了全面的事态”[12](110页)。全面地表现了一个变动的时代,是《文明小史》最有价值之处,也是它有别于其他众多谴责小说的重要因素。“一部《文明小史》,就是一部假维新史”[40](24页)。不少研究者只看到其中比《官场现形记》更多地带着作者思想的局限性而对其加以否定,这是不公允的。

参考文献:

- [1]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4.
- [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4]吴沃尧.李伯元传[A].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杨世骥.文明小史[A].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6]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7]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三[M].张汇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8]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9]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下[Z].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张之洞.张文襄公电稿:卷四十五[C].转引至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1]李伯元.文明小史·楔子[A].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2]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阿英.文明小史叙引[M].北京:北京通俗文艺出版社,1955.
- [15]新党升官发财记:十六回[M].中国近代小说大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 [16]吴沃尧.光绪万年[A].我佛山人文集:第七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
- [17]王俊卿.冷眼观:十六回[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四卷: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8]郑方泽. 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 [19]李伯元. 南亭笔记:卷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20]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Z].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 [21]连梦青. 邻女语[M]. 中国近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集:第6卷[M]. 上海:上海书店,1990.
- [22]陈天华. 警世钟[A].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Z].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 [23]张维襄.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M]. 常州旅沪同乡会印发,1944.
- [24]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M]. 张友鹤校.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25]李伯元. 活地狱·楔子[A]. 魏绍昌. 李伯元研究资料[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6]北京大学中文系. 中国小说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27]林岗. 官场与民俗——谴责小说研究[M]. 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辑[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 [28]澄碧. 小说家李伯元[A]. 魏绍昌. 李伯元研究资料[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9]张春帆. 宦海:二十回[M]. 阿英. 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上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0]武进阳湖县志[M]. 清光绪间编.
- [31]李伯元. 庚子事变弹词:二十六回[M]. 阿英. 庚子事变文学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2]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A].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3]列宁. 中国的战争[A].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4]李锡奇. 李伯元生平事迹大略附记[A]. 魏绍昌. 李伯元研究资料[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5]李国祁. 中国近代的民族思想[A]. 姜义华编. 台湾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C].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 [36]萧功秦. 儒家文化的困境[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37]黄鸿寿. 清史记事本末:卷六十九[M]. 上海:上海书店,1986.
- [38]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9]任访秋. 李伯元论[A].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 [40]庄严. 论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爱国题材[J]. 宁波师院学报,1984,(3).

Wen Ming Xiao Shi: A Mirror of Late Qing's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History

Li Da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With Li Boyuan as an influential condemning novelist, novels flouris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his *Guan Chang Xian Xing Ji*, his *Wen Ming Xiao Shi* is of the same study value. Using real persons and events in real life as the source material, and the first to set out from the angle of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t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that comprehensively reflects the late Qing society and discovers all sorts of social phenomena.

Key words: condemning novel; Li Boyuan; *Wen Ming Xiao Shi*; the late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李大明]